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朱雷 著



浙  
JHEU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朱雷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 朱雷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4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 柴剑虹、张涌泉、刘进宝主编.)

ISBN 978-7-308-15717-9

I. ①敦… II. ①朱… III. ①敦煌学—文书—研究—文集 ②中国经济史—中元古代—文集 IV.

①K870.64-53 ②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7183 号

##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朱 雷 著

- 
- 出品人 鲁东明  
总编辑 袁亚春  
丛书策划 黄宝忠 宋旭华  
责任编辑 张小苹  
责任校对 胡 畔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625  
字 数 318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717-9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助

[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执行)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惠民 卢向前 冯培红 许建平 刘进宝\* 刘 波

张先堂 张涌泉 赵声良 施新荣 柴剑虹

(加\*者是本册责任编委)

# 总 序

浙江,我国“自古繁华”的“东南形胜”之区,名闻遐迩的中国丝绸故乡;敦煌,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便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会”。自唐代始,浙江又因丝绸经海上运输日本,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浙江与敦煌、浙江与丝绸之路因丝绸结缘,更由于近代一大批浙江学人对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传播、弘扬而令学界瞩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荣昌盛,学术底蕴深厚,在时代进步的大潮流中,涌现出众多追求旧学新知、西学中用的“弄潮儿”。20世纪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流散而兴起的“敦煌学”,成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者首先“预流”者,即是浙江的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导夫先路”,几代浙江学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奋随其后,薪火相传,从赵万里、姜亮夫、夏鼐、张其昀、常书鸿等前辈大家,到王仲荦、潘絮兹、蒋礼鸿、王伯敏、常沙娜、樊锦诗、郭在贻、项楚、黄时鉴、施萍婷、齐陈骏、黄永武、朱雷等著名专家,再到徐文堪、柴剑虹、卢向前、吴丽娱、张涌泉、王勇、黄征、刘进宝、赵丰、王惠民、许建平以及冯培红、余欣、窦怀永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学术追求,也有各自的学术传承与治学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学科园地辛勤耕耘，为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发展与丝路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者，成为国际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研究领域举世瞩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群体。这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始创于1897年的浙江大学，不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渊薮，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英才辈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贯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而又敢于创新的学者专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的浙江学人而言，不仅相当一部分人的学习、工作与浙江大学关系紧密，而且每每成为浙江大学和全国乃至国外其他高校、研究机构连结之纽带、桥梁。如姜亮夫教授创办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4年受教育部委托，即在全国率先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培养了一批敦煌学研究骨干；本校三代学者对敦煌写本语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浙江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精诚合作，在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为敦煌石窟艺术的鉴赏、保护、修复、研究及再创造上，不断攻坚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原语言文学分会基础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也已经成为与甘肃敦煌学学会、新疆吐鲁番学会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术平台。由浙大学者参与主编，同浙江图书馆、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编撰的《浙藏敦煌文献》于21世纪伊始出版，则在国内散藏敦煌写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领跑与促进的作用。浙江学者倡导的中日韩“书籍之路”研究，大大丰富了海上丝路的文化内涵，也拓展了丝路文化研究的视野。位于西子湖畔的中国丝绸博物

馆,则因其独特的丝绸文物考析及工艺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优势,并以它与国内外众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享誉学界。

现在,我国正处于实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起步阶段,加大研究、传播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这对于今天的浙江学人和浙江大学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如何进一步传承、发扬学术优势的问题,也是以更开阔的胸怀与长远的眼光承担的系统工程,而决非“应景”、“赶时髦”之举。近期,浙江大学创建“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的坚实步伐。现在,浙江大学组织出版这一套学术书系,正是为了珍惜与把握历史机遇,更好地回顾浙江学人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历程,奉献资料,追本溯源,检阅成果,总结经验,推进交流,加强互鉴,认清历史使命,展现灿烂前景。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委会**

**2015年9月3日**



# 出版说明

本书系所选辑的论著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学科范围较广,引述历史典籍版本较复杂,作者行文风格各异,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历史、尊敬作者、遵循学术规范、倡导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经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协商,书系编委会对本书系的文字编辑加工处理特做以下说明:

一、因内容需要,书系中若干卷采用繁体字排印;简体字各卷中某些引文为避免产生歧义或诠释之必需,保留个别繁体字、异体字。

二、编辑在审读加工中,只对原著中明确的讹误错漏做改动补正,对具有时代风貌、作者遣词造句习惯等特征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历史地名、族名等称呼,只要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一般不予改动。

三、对著作中引述的历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处明确,核对无误,原则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动。原著没有注明版本出处的,根据学术规范要求请作者或选编者尽量予以补注。

四、对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鲁番所出古写本,一般均改用通行的规范简体字或繁体字,如因论述需要,也适当保留了

一些原写本中的通假字、俗写字、异体字、借字等。

五、对著作中涉及的书名、地名、敦煌吐鲁番写本编号、石窟名称与序次、研究机构名称及人名，原则上要求全卷统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体现时代特色或学术变迁的，可括注说明；无法做到全卷统一的则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 书系编委会

## 目 录

### 从“走近”到“走进”

-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追求历程 ..... (1)
- 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 ..... (7)
- 吐鲁番出土北凉货簿考释 ..... (19)
-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北凉“按货配生马”制度 ..... (45)
- 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 ..... (52)
- 敦煌藏经洞所出两种麹氏高昌人写经题记跋 ..... (80)
- 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 ..... (87)
- 龙门石窟高昌张安题记与唐太宗对麹朝大族之政策 ..... (102)
- 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  
其他 ..... (111)
- 吐鲁番出土唐“勘田簿”残卷中所见西州推行“均田制”  
之初始 ..... (120)
- 唐代“手实”制度杂识  
——唐代籍帐制度考察 ..... (128)
- 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  
——吐鲁番、敦煌两地出土“点籍样”文书的考察 ... (146)
- 唐“籍坊”考 ..... (177)
- 唐代“乡帐”与“计帐”制度初探  
——吐鲁番出土唐代“乡帐”文书复原研究 ..... (189)

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 .....	(222)
敦煌所出《万子、胡子田园图》考 .....	(237)
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 其他 .....	(254)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民间讲唱艺术作品的历史考察 ——21 世纪的展望 .....	(280)
敦煌写本《庐山远公话》中之惠远缘起及《涅槃经》之信仰 .....	(289)
《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辨疑 ——读敦煌变文札记(一) .....	(292)
《捉季布传文》、《庐山远公话》、《董永变文》诸篇辨疑 ——读敦煌变文札记(二) .....	(307)
《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传》、《唐太宗入冥记》诸篇辨疑 ——读《敦煌变文集》札记(三) .....	(318)
《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破魔变》诸篇辨疑 ——读《敦煌变文集》札记(四) .....	(328)
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 ——兼论“勋告”制度渊源 .....	(341)
敦煌研究院藏《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真伪辨 .....	(363)
唐长孺师与敦煌文书的整理 .....	(369)
唐长孺师与吐鲁番文书 .....	(374)
吐鲁番文书 .....	(379)

## 从“走近”到“走进”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追求历程

学术旅程由“走近”到“走进”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从“走近”到“走进”更不易。除了要有个人努力外，重要的是有无机遇，能否抓住机遇才是最重要的。

回忆起来，那还是在1946年春节，我还住在四川江北县（今重庆市江北区）的水土沱镇。家中来客谈到张大千到敦煌千佛洞画画，回重庆后办了画展，还笑他好吃，专带了厨子给他做菜。

1948年上半年，我读小学五年级上学期，那是在汉口的一所教会女中附小。当时规定每周六下午是宗教课，开始从《旧约》创世纪讲起，还要唱《普天颂赞》内的圣歌。刚上高小就由一位教自然课的老师上宗教课。大约他是一位达尔文的信徒，不像过去宗教课的老师，不讲《新旧约全书》而是讲故事。现在还记得几个，如讲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随商人入海得了宝，发了大财。到进入初中看课外读物，才知道就是《今古奇观》之类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又一次讲的是麻城王道士，在敦煌千佛洞吸烟，点烟用的麻秆在把烟点燃后，就顺手往墙上插，习以为常。一次麻秆突然掉进墙洞里，赶紧把洞拆开，才发现原来是夹墙，也就发现了“藏经洞”。里面有很多的经书，很多都被外国人拿走了。当年我年少无知，只是当故事听。1973年12月下旬到敦煌千佛洞，在一个寒夜去一间寒窑访问史苇湘先生。讲到当年听过的故事时，史先生也说有此一说。

1950 年上初中以后，看到不少敦煌千佛洞的临摹画的图片，也看到了旅顺博物馆出的图片，是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考古所获，记得还有干尸的照片。在某期《新华月报》上看到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的图文报导，留下了深刻印象，心中暗暗发誓：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心愿在 1973 年 11 月终于实现了！

1955 年 9 月我如愿以偿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我一开始喜欢攻商史，所以买了朱芳圃的《甲骨学商事篇》，看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述林》。但听了唐长孺教授的魏晋隋唐史的课，还看了他的文章，就转向 3—9 世纪史的研究。在看了唐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后，不管当时是否看懂了多少，我却深深喜欢上了这段历史。

1958 年秋，开始了“教育革命”。当时我任班长，以为可以在课程设置、讲授内容及方法上做些改革。但事实上愈来愈激烈的“革命”，有些没读什么书的人，说要批倒搞臭王国维、陈寅恪、唐长孺的发言，我忍不住说：我没有你们那样大的志向，如果一辈子能读懂他们的著作，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不合时宜的观点，我就成了“大白旗”被批判了。专用的大批判教室内，宿舍周边墙上贴满了批判的大、小字报，最后班长的职务也被罢了。

1959 年，我大学毕业了！幸蒙批准报考研究生，同年 12 月初下乡劳动归来，唐师上了几节小课。1960 年初，又继续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此时研究生教育不能走资产阶级专家路线，要教研室集体培养，在斗争中成长的极左观点，比起 1958 年来讲是更“左”，更具体深入。先是参加为刚入学的学生编古代史教材，继又参加编写《鄂东北党史》，批判陈寅恪史学观点（影射唐长孺教授）。1960 年 10 月下旬，部分师生参加新洲县的整风整社运动，直到 1961 年 3 月返校。在农村无书可看，我在仓埠新华书店花

10元买了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没事就翻翻看看，背古今地名。

1962年秋，研究生毕业，我留校在研究所任助教。当时唐师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通读《全唐文》，做出分类卡片，摘录史料。二是1957年夏，在北京历史研究所陪唐师阅读该所新购斯坦因、伯希和所窃敦煌文书胶卷，摘录有关经济和社会资料，再作核对。这就是唐师把我引到敦煌学的门口。<sup>①</sup>由于要借用大图书馆的阅读器，我遂白天在图书馆使用阅读器读资料，夜间摘录《全唐文》。次年，两项任务完成。我正想有点时间作“私活”，可以开工了，但抓阶级斗争又开始了。

1963年秋，学校开始“五反三清”，又要抽调教师参加，当然首先是抽调我们这些缺乏阶级斗争的教师参加，查账、外调搞专案。我利用历史考证功夫去调查取证，无法查证的查证清楚了，已作结论定性的，我从书法辨认上予以否定。结果半年过了，别人都回系了，我却因搞得有成绩而被留下继续工作。如外出调查，我就随身带一本《全唐诗》，有空翻翻看看，需要的材料就作卡片。如在校内，完成工作后就利用夜晚挑灯夜读。1964年8月回系工作，9月带学生下乡劳动锻炼，10月中旬就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7月回校后，又开始批判海瑞清官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十年浩劫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无尽的伤痛，我也深受影响……

“文革”末期，为了写出一部超越此前的“左”得不能再“左”的中国古代史教材，由三结合（教师、工人师傅、工农兵学员）编写出“红布”（指过去提“红线”还不够）的历史，需要外出收集考

<sup>①</sup> 朱雷：《唐长孺师与敦煌文书的整理》，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唐长孺教授逝世10周年纪念专辑》。

古资料，申请了一笔经费后，决定去洛阳、西安、兰州、新疆、敦煌等地，我乘机增加了天水麦积山，以实现当年的梦想。

1973年12月中旬的一个寒夜，火车抵达乌鲁木齐，下车后阵阵寒意袭来，但心情却兴奋不已。第二天到博物馆看到展出的吐鲁番文书，更令人大有如玄奘到了西天，看到佛金口所言的真经那样激动！因新疆天寒地冻等等原因，决定暂时不去吐鲁番，改奔敦煌。

12月下旬的一个黄昏，我到了千佛洞，这个让我20余年为之魂牵梦萦的地方。虽然天气寒冷，生活艰苦，我们仍然坚持白天进洞参观，边听讲解边作记录，不时还提出问题请教。夜晚看有关文献，或是去寒窑访问老的工作人员，还有机会见到常书鸿先生。

正因此行有所收获，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决定由唐长孺教授领导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sup>①</sup>在唐师指导下，我们作了初期准备工作后，于1974年10月初到达乌鲁木齐，立即开展工作。我也自带商务印书馆缩印百衲本两《唐书》，开明本缩印《南》、《北》二史，还有不少与此有关的著作，如岑仲勉、冯承钧、贺昌群、蒋礼鸿……等先生的著作。白天就了解“家底”（即馆藏吐鲁番文书有多少），历年墓葬发掘报告有多少及其内容，发掘整理资料内容。夜间因有暖气可以通宵达旦看书，在此期间我阅读了大量史籍和中外学人的研究成果，这才逐渐达到“进入”境界的门槛。

次年5月初，我作为唐师助手，随其再赴乌鲁木齐，就在即将开始工作时，唐师到库车千佛洞，因路况极差过于颠簸，导致右眼底出血，回京住院治疗，我则留在新疆继续从事整理工作。我还

<sup>①</sup> 朱雷：《唐长孺师与吐鲁番文书》，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到吐鲁番整理地区文保所发掘的文书、墓志,并考察了交河、高昌两古城遗址保护情况。

1975年10月15日,唐师出院,回到国家文物局,继续领导吐鲁番文书整理。因为我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吐鲁番两边整理工作,加之对日本方面整理文书的了解,遂令我起草一份“录文须知”。在整理文书工作时,我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要协助唐师工作,从而学到了不少知识。大约从1974年开始整理出土文书,1986年1月底结束整理工作;如果再加上2010年8月再赴乌鲁木齐整理博物馆本世纪初新发掘的四座墓,以及上世纪的20座墓葬遗漏文书的录文、拼对、标点、注释,至12月初完成;前后两次共计十三个年头,我终于算是“进入”了敦煌吐鲁番学的门槛。到了敦煌、吐鲁番,不等于说“进入”两学,而是从深入研究入手,广泛求证得出正确结论,才能提出超越前人或是能发人深省的问题。

回想自己十几年致力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感慨颇多!

在“文革”后期,百废待兴,而我有幸走进了新疆,有幸走进了吐鲁番,有幸接触并整理了吐鲁番出土文书。从初识出土文书,经过艰难跋涉,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事业的顶点迈进,终于走进敦煌吐鲁番学,成为一个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学者。

出土文书整理是个大工程,要把那些千头万绪的纸片,一点点看明白,理出头绪,抄录到稿纸上,根据纸质、字迹、内容有序归类,完成释文、拼对后,再融合自己的历史知识、文献资料,给文书断代、定名,必要的注释,等等。要想把文书整理成精品,谈何容易!在漫长的十几年文书整理中,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是:要耐得住寂寞,甘愿清贫,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求得真知,要在知识的海洋里寻找“真金白银”,寻找人生的乐趣。